

第四章

論大學的知識社群特質

一、引言

在邁向二十一世紀的海峽兩岸，各方面都正在經歷跨世紀的轉變。在二十世紀最後十年間，台灣政治民主化與大陸經濟的改革開放，是歷史的巨變之中最引人注目的兩個主流現象。隨著政治與經濟的轉化，台灣的大學院校也受到政治力與經濟力的衝擊而面臨諸多挑戰。我們在本書第一章至第三章所論述的全人教育理念以及專業倫理與道德教育理想，都以大學作為正式的實踐場域。本章的主旨就在於析論大學作為知識社群之基本特質。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大學既是知識創造與傳播的中心，又是知識份子聚集的場所，中國從漢代建立太學以來，太學一直是培養中華帝國官僚的重要場所，但是太學生受教育的過程中飽讀儒家經典、深受儒家抗議精神所洗禮，中國知識份子聚集的場所——太學，又常常成為為人民伸張正義、批判腐敗的統治者的重要據點。漢代太學生批評朝政而引起兩次黨錮之禍，而宋代太學生的救國運動，乃至五四時代以北大為中心的知識

青年愛國運動，都可以視為傳統中國歷史上大學所發揮的重要功能。古代中國的太學教育所保存並發揚的文化理想，與帝王專制的政治現實之間一直存緊張的創造性關係。¹但是，隨著工業化與政治民主化的來臨，大學卻從傳統的官僚養成場所，逐漸轉化為知識經濟的重要工廠，大學在現代歷史上也常常扮演政府的「智庫」(think tank) 角色。那麼，到底大學最重要的特質是什麼？展望二十一世紀的發展，大學應該扮演何種角色呢？這些都是值得關心大學教育的人士共同思考的問題。

本章寫作的目的在於扣緊下列三個問題進行分析：

- (1) 大學創造知識的動力何在？
- (2) 大學的知識社群有何特質？
- (3) 大學社群內知識的傳播者（老師）與接受者（學生）關係的本質如何？大學師生的社會角色又如何？

本章針對上述三個問題進行思考，除第一節引言之外，第二節先分析在工業化與資本主義化的衝擊下，大學之異化的各種類型與狀況，以作為我們思考大學的知識社群特質的背景。第三節探討大學創造及傳播知識的動力之兩種類型及其本質，

¹ 關於這一點，參看拙作：Chun-chieh Huang, “Some Observations and Reflections,” in Frederick P. Brandauer and Chun-chieh Huang eds., *Imperial Rulership and Cultural Change in Traditional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4), pp. 281-289.

第四節則進入本文的中心論旨，指出大學的知識社群特性在於大學具有「自主性」，大學具有與政治社群迥異之特質，因為大學作為知識社群是以追求真理為其所以存在之理由，為了完成大學追求真理的目標，大學特別講求學術獨立與學術自由，本章第五節則進一步論述大學知識社群中，師生關係及其社會角色；第六節，綜合全文論旨提出結論性的看法，指出當前大學的理念與實際落差甚大，而大學理念的復興是重建大學之知識社群特質的前提，大學理念復興之關鍵則在於大學自主性的建立。

二、大學的異化之諸類型

在分析大學的知識社群特質以及大學創造知識的類型與本質之前，我們先考察現階段大學的「異化」(alienation) 的各種型態，並探討大學異化的原因。

2:1 大學成為知識的百貨公司：

在資本主義生產與再生產的過程中，社會分工日趨細密，大學處於資本主義發展的潮流中，其性質逐漸從追求真理的知識殿堂，而被扭曲為知識的百貨公司。舉例言之，數年前台灣的殯葬業者曾經在報紙刊登巨幅廣告對教育部施壓，要求教育部指示大學設置殯葬學系，以提供該行業所急需的人才。這個

例子可以說明，在資本主義高度分工的經濟結構中，大學常常會受到經濟部門的壓力，而淪為知識的百貨公司的角色，為資本主義社會中各行各業的需求，而生產各行業所需之勞動人力。²

但是，為什麼大學成為知識的百貨公司，應該被視為一種大學的自我「異化」呢？我們說這種現象是大學的自我「異化」，主要是因為大學一旦淪為資本主義社會分工體系中知識的百貨公司的角色，它必然會從大學之為追求真理殿堂的基本性質中脫離而出，使大學不再是為探索真理而存在。在大學成為資本主義社會的婢女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這是大學的「異化」。

2:2 大學成為國家意識型態的生產工廠：

所謂「大學成為國家意識型態工廠」，是指在近代世界教育史上左右各派的集權政府，常常透過各種機制要求大學為國家意識型態背書，並且生產國家意識型態的代言人。³國家要求大

² 關於大學與資本主義國家的關係，參看：Clyde W. Barrow, *Universities and the Capitalist State: Corporate Liberalism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1894-1928*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0).

³ 但是，正如當代人類學家葛茲（Clifford Geertz）所說，任何文化系統均不可避免地包含某種或某些意識型態，但是，學術與意識型態的差別正是在於：學術可以對意識型態進行客觀瞭解、批判，並迫使意識型態必須面對事實。參考：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chap. 8, "Ideology as Cultural System," pp. 193-233, esp. pp.

學延續並生產國家意識型態，主要是通過共同必修科目而實施，舉例言之，在威權體制時代的台灣，所有的大學院校學生都被要求必修某些意識型態課程，國立大學在當時政府主導之下設置以意識形態為中心的研究所。在新政府以財力緊縮為由而大幅裁減國立大學預算之際，最近新政府教育部卻正式發公文，要求各大學設立某些特定系所，這是政治干涉大學學術自主的最新例證。這種干涉的結果就是使大學淪為國家意識型態的生產工廠。

大學社區裡所研究的各種知識領域，當然包括古今中外各型各色的意識型態，那麼，為什麼大學成為國家意識型態的生產工廠，就是一種自我「異化」呢？關於這個問題，我們要從大學的任務開始思考。正如前文所說，大學是探索真理的殿堂，真理並不為特定的權力集團、政權或既得利益團體而服務。⁴「意識型態」與「真理」之不同，乃在於「意識型態」通常是為特定的權力中心、政權的掌控者而服務，為權力系統提供合法化的思想基礎，所以從這個觀點來講，一旦大學成為國家意識型態的生產工廠，那麼大學就背叛了他作為探索真理的殿堂的基本性質，所以大學就不能免於自我「異化」的悲劇。⁵正如韋伯

232-233.

⁴ 關於這一點，分析最為深刻的論著之一是：José Ortega y Gasset, ed. and translated by Howard Lee Nostrand, *Mission of the University* (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1, 1992), esp. pp. 47-56.

⁵ 關於意識形態與各級教育之關係的初步研究，參考：陳伯璋編著：《意識形

(Max Weber, 1864-1920) 在著名的〈學術作為一種志業〉演講稿中所說，教師不應該扮演先知的角色，「今天人的命運，是要活在一個不知有神，也不見先知的時代」。⁶台灣是一個意識型態諸神的戰場，台灣的大學師生對韋伯的一段話更應三復斯言。

2:3 大學成為職業訓練中心：

大學所創造的知識常常可以發揮巨大的邊際效益，其中最為顯著的就是使大學的畢業生獲得求職的基本能力，而在社會的分工體系中很快的找到自我定位，加入生產與再生產的行列，尤其是大學中的各種熱門科系的邊際效用尤為明顯，於是，流風所及在許多家長以及大學生的心目中，大學教育就變成職前訓練，而大學也就與職業訓練中心毫無二致。許多大學的領導人常常也以畢業生高就業率而沾沾自喜，使大學淪為職訓中心，這是大學的「異化」的第三種類型。

大學之所以不是（或不僅是）職業訓練中心，乃是因為職業訓練中心所提供的教育，著重於開發受教育者的某一種特定的面向或能力，以便提升受教育者的生產能力。但是大學教育的本質則不是如此，職業訓練中心的教育並不涉及受教育者主

態與教育》(台北：師大書院，1988，1993)。

⁶ 韋伯著，錢永祥編譯：〈學術作為一種志業〉，收入：《韋伯選集（I）：學術與政治》(台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1985)，頁 147。

體性的覺醒之問題，但是大學教育的目的是在於喚醒受教育者的主體性，使他能夠成爲一個西方諺語所謂的「會思想的蘆葦」。所以，當大學自我定位爲職業中心以後，大學實際上已經從最重要的「喚醒主體性」這個教育功能中逸脫而自我「異化」。爲了挽救大學自我「異化」爲職訓中心之危機，以批判思考爲中心的人文教育就顯得特別重要。⁷

從美國的大學發展史來看，大學作爲職業訓練中心這種發展趨勢，主要是在 1960 年代至 1980 年代之間。正如柯爾 (Clark Kerr) 所指出，在上述二十年間，美國的大學 (尤其是社區學院) 快速擴章，學生人數大增，學門日趨專業化，尤其是工程與管理學門擴張甚速。⁸這種發展加速大學淪爲職業訓練中心的趨勢，成爲我們必須嚴肅面對的問題。

三、大學創造及傳播知識的動力：類型與本質

在回顧了現代大學「異化」的幾種主要類型之後，我們接

⁷ 科技愈是進展，人文教育愈見其重要性。最近針對這一項命題提出深刻論證的是 A. Moulakis。參看：Athanasios Moulakis, *Beyond Utility: Liberal Education for a Technological Age* (Columbia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94), 尤其是 part one, pp. 9-40。

⁸ Clark Kerr,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1960-1980*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1), pp. xii-xiii.

著分析作為探索真理的殿堂的大學之創造及傳播知識的動力。「大學」這個字的拉丁文是 *universitas*，其原意是指一個包含知識的所有分枝領域或教師的學校 (*universitas facultatum*)，但是在歷史上符合這個字原義的大學都從未出現。「大學」多半只是一群人之組合而已，到了公元十二及十三世紀的歐洲，「大學」開始被用指老師或學生的組合。⁹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大學創造及傳播知識至少有以下兩種不同的型態：

3:1 古代型：道德關懷作為知識建構的基礎。

近代以前傳統中國的教育，尤其是民間的書院教育，基本上是以道德關懷作為知識傳播與創建的動力。從漢代以降，太學師生以德性及氣節相勉勵，對朝廷政治提出批評，一直是中國高等教育的傳統。雖然隨著帝國專制王權的逐漸高漲，尤其是宋代（960-1279）以後，官學漸漸淪落而成為官僚的養成所，而民間書院也常出現被官學化的趨勢，但是讀書的目的在於為了明理，在於自我建立，在於使學生「知書達禮」，一直是傳統中國讀書人的求學目標。

正如李弘祺所說，傳統中國教育的目標除了於培養器度通

⁹ 參看：Hastings Rashdall, ed. by F. M. Powicke and A. B. Emden, *The Universities of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95, 1936, 1997), vol. 1, pp. 4-5.

達的知識份子，面對專制君王提出諫爭、抗議或批評之外，更在於培養一般的平民，在封閉而一元化的社會中，找尋精神及心靈的昇華。這兩種教育功能基本上互相聯貫，一方面肯定既有封閉而專制的政治結構，認為為了維持政治及社會的安定，不可以輕易加以動搖。但是另一方面，在政治結構及意識型態的層層枷鎖中，面對「無可逃於天地之間」的莫可奈何境況之下，傳統中國受過教育的人卻並不可以因此喪失他的真誠和良心，他們常常在外在條件的束縛下，經由自我的解放而追求內在的心安理得。¹⁰

3.2 現代型：功利主義作為知識創造之動力。

十九世紀末以後，現代型的大學開始出現於中國，1895年創設於天津的北洋工學院，以及1896年創設於北京的京師大學堂，是近代中國最早的現代型大學。京師大學堂自1896年開始辦以後，爭議不斷，但是在歐風美雨侵襲之下，追求富強是中國知識份子共同的心願。雖然實際參與辦理京師大學堂的執事人員多屬於科舉出身的在職京官，因此守舊派人士得以攀附政治勢力，但是維新派人士同樣也援引政治勢力。在「新學與舊學」及「中學與西學」的思想論戰過程中，維新派固然承認西

¹⁰ 李弘祺：《宋代教育散論》（台北：東昇出版事業公司，1980），〈自序〉，頁3-4，並參考 Thomas H. C. Lee, *Education in Traditional China: A History* (Leiden: E. J. Brill, 2000).

學的價值，然而並未揚棄中學的價值。維新派就在「中體西用」的共通觀念下，提出一套比較完整而有系統的教育改革方案，使京師大學堂成爲調和新舊思想與融貫中西學術的大熔爐，成爲近代中國追求國家富強的現代型大學。¹¹京師大學堂到民國以後改制成爲北京大學，是中國現代大學之先鋒，尤其是 1916 年，蔡元培接掌北大以後，銳意北大改革，成爲現代中國教育與學術的重鎮。¹²

再從台灣近代高等教育史來看，現在國立台灣大學的前身是日據時代的台北帝國大學，創立於 1928 年 3 月。創校初始，台北帝大設立文政學部與理農學部及因取消高等農林學校而設立之附屬農林專門部。1936 年 1 月 1 日增設醫學部，合併台北醫學專門學校；1941 年 4 月設立台北帝大預科，專事養成該校入學之新生，分文、理兩科，理科再分農類、工類及醫類，修業年限原定三年，暫改二年，與高等學校同，畢業後升入帝國大學。1942 年理農學部分爲理學和農學部，翌年復設工學部。至 1944 年爲止，計有文政、理、農、工、醫五部。文政學部內部有 25 講座，理學部有 13 講座，農學部有 22 講座，醫學部有 24 講座，工學部有 30 講座，亦即共有 5 學部、17 學科、114 講座。其他的附屬機構包括（一）附屬圖書館，（二）附屬農場，（三）附屬醫院，（四）附屬熱帶醫學研究所，並附設士林支所、

¹¹ 參考：莊吉發：《京師大學堂》（台北：台大文學院，1970），頁 142-143。

¹² 參看：吳家瑩：《蔡元培與北大校務革新》（花蓮：花蓮師範學院，1992）。

台中支所、台南支所三所。1937年成立「南方人文研究所」、「南方資源研究所」，1939年成立「熱帶醫學研究所」等單位，則針對台灣、華南以及南洋各地的資源開發而進行研究。¹³台北帝大在日據時代基本上是爲了配合日本帝國的殖民政策與南進政策，而進行學術研究。光復以後的國立台灣大學，新系所的增設與光復以來政府的經濟政策，有頗爲密切的關係。一言以蔽之，台大的個案很可以顯示，功利主義籠罩下大學的現實取向日趨強烈。

3:3 大學本質的批判：從以上回顧傳統型以及近代型大學的性質及其發展，我們可以發現：以上不論是以道德關懷或是以功利主義爲基礎的大學，都有所不足，因爲前者所建樹的是「道德知識」，對於自然世界的探索顯然不足；後者則以富國強兵爲目標，使大學爲政治服務，終不免使知識部門被政治力所滲透甚至顛覆，所建樹的是實際的功利之學，短期內或可創造某些邊際效用，但長期而言則未必對整體社會有所助益。

在大學的發展史上，大學雖然可以有各種類型，大學也可

¹³ 關於台灣大學校史的初步研究看：黃得時：〈從台北帝國大學設立到國立台灣大學現狀〉，《台灣文獻》第26-27卷41期(1976)，頁224-245；吳密察：〈從日本殖民地教育學制發展看台北帝國大學的設立〉，收入：氏著：《台灣近代史研究》(台北：稻香出版社，1991)；歐素瑛：〈光復期的國立台灣大學(民國34-38年)〉，《國史館館刊》復刊第24期(1998年6月)，頁51-90。

以在各種力量的衝擊之下，而自我異化，但是，大學最根本而且也是最重要的本質，應該是作為知識的殿堂。¹⁴大學師生只有堅持大學的知識殿堂之本質，大學才可以「是一個理智的共同體，在這個共同體中，專家、發現者和實驗者除了履行對於他們專業的職責之外，還要承認具有互相交談和理解的責任。如果他們能夠在他們自己之中恢復交談的條件，那麼他們就能成爲一所大學、一個合作的思想者的團體，而這種大學或團體就能發揮理智的領導作用，並有望在塑造其時代的思想方面做出某些適當的成就。」¹⁵

四、大學的知識社群特性：「自主性」及其內涵

從上節的回顧與批判，我們可以進一步思考大學的特性。一言以蔽之，大學是屬於知識份子的，為知識份子而存在，並把所有知識加以統合的地方。在這項定義之下，大學作為「知識社群」，具有何種特點呢？大學知識社群至少有以下兩種特性：

¹⁴ 將大學的這項本質論述得最為有力而清晰的是：Robert Paul Wolff, *The Ideal of the University* (Boston: Beacon Press, 1969, 1970).

¹⁵ Robert M. Hutchins 著，陸有詮譯：《民主社會中教育上的衝突》（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94），頁 89。

4:1 大學具有自主性：

大學具有「自我立法」(self-legislature)的功能，它無待於其他的社群來為它立法。換言之，大學具有「自作主宰」的能力。這種「自作主宰」(self-mastery)的能力，與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所批判的「奴隸的道德」(“Slave’s morality”)構成強烈對比。只有大學具有自主性，大學師生才能獲得心靈的自由，悠遊於智慧的大海。¹⁶台灣是一個移民社會，數百年來功利主義思想瀰漫於台灣社會，深深影響了教育政策的制定與大學的運作。許多大學在功利主義風氣影響之下，並無自主性可言。大學之前的各級教育，基本上是升學預備班，大學則成為職業訓練所，許多大學扮演的角色不過是經濟部職業訓練中心工程組或醫學組而已。大學的存在已經不再是為了喚醒學生的主體性，大學存在的目的常常不是為了教育本身而存在，而是為了教育以外的目的如升學或就業，也因此台灣的許多大學缺少獨特的風格，並且常常成為資本主義的弄臣或政治權力的附庸。

4:2 大學具有獨特性 (uniqueness)：

¹⁶ 參看：Peter Graf Kielmansegg, “Freedom of Mind and University Autonomy,” in John W. Chapman ed., *The Western University on Trial*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pp. 39-45.

大學是一個「知識社群」(intellectual community)，它不同於政治社群(political community)之處在於：在「政治社群」中只要遵守「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政治人物只要擁有多數選民的支持就可以掌握權力；但是大學以追求真理為目標，大學知識社群裡所認同的是真理，真理無需投票表決。「知識社群」的目標在於追求真理，因此必須講求「學術獨立」與「學術自由」。所謂「學術獨立」是指：在學術領域內的各種活動不受非學術領域的不當干擾。「學術獨立」的範圍基本上是指與知識創造及傳播有關的各種活動，例如教授的研究課題及內容，校長及其他政治單位如教育部都不能干涉。但是，所謂「獨立」是在相對的脈絡來說的，舉例言之，「老師」的概念是相對於「學生」而說的，大學裡「老師」的概念，只有在與「學生」相對的脈絡之中才能存在，「老師」的角色也才能產生其相對意義。大學的「獨立」也是在與大學以外的社群相對的脈絡中才能成立。

我們再進一步探究，達到「學術獨立」有何方法呢？一言以蔽之，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回歸學術本位」。大學中任何政策或教學實務，均應以學術為依歸。為捍衛學術的獨立與自由，對於干預學術的外來力量如政治權力或資本主義力量，都應加以批判。接著，在「學術自由」這個概念中，「自由」可以區分為兩種：一種是「積極的自由」(positive liberty)，這是指“Freedom of ...”的自由。另一種是「消極的自由」(negative liberty)，這是指“Freedom from...”的自由，例如「免於被脅迫

的自由」(Freedom from being intimidated)、「免於被政治化的自由」(Freedom from being politicized)等等。從消極面來看，大學師生有免於被政治化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但是，大學師生更應有「積極的自由」，在大學知識社群裡，承擔重要責任的教授們，對於「積極的自由」更應努力捍衛，並防止自由的誤用與濫用。¹⁷

五、大學知識社群中的師生關係及其角色

在論證了大學的基本性質是一種知識社群之後，我們進一步探討大學知識社群中的師生關係及其角色。(5:1)傳統中國社會中的師生關係是一種從屬關係，師生之間德業相助，功過相規，學校成為道德共同體。(5:2)但是，現代大學中的師生關係是一套由「權利——義務」所規範的契約關係，但現代大學師生應是以追求真理為志業的知識份子，以社會清流為其主要角

¹⁷ 必須在此接著說明的是：大學的自主性在某種特定歷史情境之下，卻會對學術自由有所傷害。Byron K. Marshall 研究日本東京帝國大學與日本帝國的關係，發現在日俄戰爭(1904-05)時，東京帝大教授與校長團結抗拒帝國當局對大學的干涉，但是到了1930年代戰爭期間，同樣受到帝國當局的干涉，東京帝大校長卻開除了許多教授。Marshall 指出，主要原因在於在1930年代帝國大學已經建立了自己的自主性，反而倒過來壓制學術自由。參看：Byron K. Marshall, *Academic Freedom and the Japanese Imperial University, 1868-1939*(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esp. pp. 122-180.

色。我們闡釋以上這兩項看法。

5:1 傳統中國學園是一個道德的社區：傳統中國知識社群中的師生關係，是一種道德共同體。《論語·子路》中，孔子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這句話雖是對國君講政治領導應以德行優先，但也是孔門師生共勉的道德目標。孔子（551-479B.C.）說：「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論語·述而》），先秦孔門師生正是以進德修業相勗勉。在古典中國的教育社群中，教師是道德楷模，《呂氏春秋·誣徒》說：

達師之教也，使弟子安焉、樂焉、休焉、游焉、肅焉、嚴焉。此六者得于學，則邪辟之道塞矣，禮義之術勝矣。此六者不得于學，則君不能令于臣，父不能令于子，師不能令于徒。人之情不能樂其所不安，不能得于其所不樂。為之而樂矣，奚待賢者？雖不肖者，猶若勸之；為之而苦矣，悉待不肖者？雖賢者猶不能久。反諸人情，則得所以勸學矣。

這是古代中國知識社群的共識。在古代中國社會中，「君子隆師而親友」（《荀子·修身》），尊師重道是學生的行為準則，而老師則是學生的道德典型，《荀子·致士》說：

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尊嚴而憚，可以為師；耆艾

而信，可以為師；誦說而不陵不犯，可以為師；知微而論，可以為師。故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

荀子（約 298-238B.C.）所列舉的四類老師，都以德行與修養作為學生學習的對象。到了公元第八世紀「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昌黎，A.D. 768-824）強有力地宣示：「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¹⁸更是將「師」與「道」合而為一。正是在這種教育史背景之中，南宋大儒朱子（晦庵，1130-1200）主持白鹿洞書院時，邀請陸九淵（象山，1139-1193）來訪，「九淵為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熹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¹⁹這個故事充分顯示傳統中國的知識社群，所講求的主要是道德知識，所以，傳統書院師生均以進德修業互相砥礪。

由於傳統中國的知識社群是一個道德共同體，所以師生關係極其親切，師生之間的關係，可親如父兄子弟，也可嚴如君臣、近如朋友。社會的五倫關係，除夫婦一倫外，其餘四倫，均可在傳統的師生學團找到擬制的關係，這也是原始儒家將師生（師弟）關係在喪服禮中，規定為無服的理由所在。高明士指出：在儒術獨尊以後，儒教的社會倫理是以親親、尊尊為主

¹⁸ 韓愈：《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四部叢刊初編縮本），卷 12，〈師說〉，頁 101-102。

¹⁹ 〔元〕托托：《宋史》，卷 434，〈儒林列傳〉。

要綱索；五倫之中，自以父子一倫為主軸而展開，師生關係亦然。傳統中國既尊師，又強調天地間的自然秩序、政治秩序、倫理秩序，必須靠師教才能理解。²⁰換言之，師生關係不僅以「道」作為結合之基礎，而且也反映宇宙自然之合理秩序。

5:2 現代大學的師生關係是一種契約關係：在社會逐漸工業化之後，傳統的親緣關係的重要性也逐漸被業緣關係所取代。現代社會中大學裡的師生關係，也逐漸轉化成某種契約關係。在現代台灣的大學知識社群中，老師和學生都經由《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以及根據以上兩項文件而制定的大學組織規程，賦予明確的法律規範。

我們以台大為例加以說明。《國立台灣大學組織規程》（1996年3月10日教育部（85）高（一）字第85018154號函同意核定實施）第六章第63條規定：「本大學學生之權利與義務，應依大學法、大學法施行細則、本規程及依據本規程所訂定的各級辦法規範之」，第68條規定：「本大學各級學生自治組織應依相關辦法選舉代表出席或列席校務會議、院、系、所務會議、教務會議、學生事務會議及其他與學生權益相關之會議。院、系、所務會議應於其組織規則中規定學生之出、列席權利」，這些條文都是在法律層面上明確規範學生與學校、學生與老師

²⁰ 高明士：〈傳統社會中的師生關係——群己關的一個縮影〉，《科學發展月刊》，第18卷第1期（1990年1月），頁15-28。

之權利與義務關係。傳統中國書院教育中師弟情誼以及道德共勉的精神，已經隨風而逝。

其實，現代大學中師生關係被納入法律上的契約關係之中，正是世界各國大學普遍性的發展。以美國的大學為例，在大多數美國的大學校園中，學生與教師皆參與校務運作，若干大學中學生雖參與而不具投票權。舉例言之，在一般公立大學所稱之董事會 (Board of Regents)，麻省理工學院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 則稱之為 MIT Corporation，以治理校務。學生在這個組織中並無直接參與，有一些席位保留給最近的畢業學生，其能代表學生對一些問題的意見和看法。在 Corporation 之下有一委員會包括一些學生和教師，其職責在將一些影響學校某些部門的問題向 Corporation 報告。麻省理工學院並未設有教師評議會 (Faculty Senate)，教師在其轄權範圍內作政策之決策，對其轄權範圍外，則對行政當局作建議。學生自治團體中的某些特定代表在教師會議上有發言權，但無投票權。有許多教師的常設委員會皆包括一些學生成員，學生是教師會議上的重要建言者，可以在會議上提出問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是私立大學，董事會 (Board of Trustees) 管理校務，每年一位將畢業的四年級學生被推選擔任四年任期的董事會成員。董事會一直保有四位年輕的董事，具有完全的投票權和其他權利。該校的學術委員會 (Academic Council) 則由人文、科學和工程學院之十二位教師組成。學術委員會、學院院長和副校長決定所有學術決策之權力。學生委

員會 (Student Council) 選出的大學部學生，以參與課程委員會的方式參與教育政策的決策。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學生也以參與學院院長和全校性的顧問委員會的方式，而參與學校有關的決策。學生的建言來自學生委員會，經由執行委員會 (Executive Board) 和學生委員會指定人 (Council appointees to committees)。每年秋季皆舉行學生滿意程度之調查，每一學期末皆辦理學生對課程和教授之評鑑。此外，馬利蘭大學 (University of Maryland at College Park) 由 17 位成員組成之董事會 (Board of Regents) 所管理，由馬利蘭州州長所任命。董事的成員之一為學生，享有和其他成員同樣的權利和特權，包括對直接影響學生事物的投票權。馬利蘭大學學生評議 (Student Senators) 全程參與學校政策之發展，對任何政策立法皆有投票權。

除了上述各校之外，私立的康乃爾大學 (Cornell University) 董事會 (Board of Trustees) 包括二位遴選之學生具有完全的投票權。教師委員會 (Faculty Council of Representatives) 無學生代表，惟學生可參與成為某些教師委員會會員。學生議會和研究生及專業學生議會提供學生參與學校政策決定之管道。洛杉磯加州大學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評議會 (Board of Regents) 則共有 28 位評議員，其中一位是任命的學生代表，九個加州大學校區各提名申請人，經由各別學區學生協會、加大學生協會之遴選委員會之審核，最後三名候選人由評議會決選同意。評議會管理整這加大學校系統。另外，私立的杜克大

學 (Duke University) 董事會 (Board of Trustees) 有三位學生代表，二位是大學部四年級最後一學期的學生，一位是研究所學生，每位任期是三年，每位皆有投票權，而且直接、積極地參與學校政策的決定。此外，在艾默利大學 (Emory University) 董事會 (Board of Trustees) 中，學生並無投票權，惟該校同意三至五名的學生參與出席校園生活委員會 (Campus Life Committee)，但無投票權。范德畢爾特大學 (Vanderbilt University) 董事會 (Board of Trust) 無在學學生代表，但為表達學生對學校事物和活動之意見，校友協會每年自大學部行將畢業之學生中，提名一位參與董事會之選舉，如經提名並當選者其任期始自下屆董事會議，合格任期為連續二任，每任二年。第一次當選者，必須九年後方可參與再選舉。卡內基美倫大學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董事委員會 (Trustee Committees) 中，學生出席參與委員會，可表達對各項事物之意見，但於董事會議上，學校官方之議案，學生無投票權。

從以上簡介國內外大學對學生參與校務之規範中，我們可以看出：現代大學已經不再像傳統書院一樣地是一種道德的社區。相反地，現代大學校園中的師生關係受一套「權利——義務」關係所規範，而成為一種契約關係。

但是，我想要在這裡強調的是：現代社會中大學師生都是學術研究的專業人士，他們應追求並服膺真理，他們並不是一種社會政治階級（如農人階級、工人階級或資產階級），所以，

大學師生既不與任何「既得利益」(vested interests)階級或團體掛鉤，也不為任何政治團體或個人利益背書。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大學知識社群中的老師和學生是社會的「清流」，因為他們對任何權力會經濟利益的掌控者，都抱持批判的態度。

六、結論

二十世紀的最後 10 年，不僅見證了世界歷史扉頁的快速翻動，也見證了台灣高等教育的急驟擴張。從 1989 年柏林圍牆倒塌、前蘇聯解體、東歐共產集團瓦解到亞洲的兩韓開始對話，台灣開始快速民主化，一系列的政治變動，伴隨著高科技的發展與世界經濟版圖的重整，使戰後世界史中「全球化」的潮流更為波濤壯闊。但是，正是在「全球化」潮流快速發展之時，「本土化」作為戰後世界的另一股潮流，也並駕齊驅，同步發展，兩者構成辯證互動的關係。在二十世紀歷史旋乾轉坤的關鍵十年裡，台灣的高等教育部門在政治民主化的衝擊之下快速成長。台灣的大學院校總數已經多達 150 所。展望未來，在世界各國大學經費普遍匱乏的大趨勢下，²¹台灣的高等教育將面臨極為嚴峻的挑戰。

²¹ 即使是經費充沛，為國內許多大學校長所欣羨的某些日本國立大學也有財難之嘆，東京大學前任校長就著書大嘆經費不足，參看：有馬郎人：《大學貧乏物語》（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6）。

二十一世紀台灣的大學院校所面臨的挑戰，不僅是國內就學人口的萎縮，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以後外國大學來台設分校的競爭，而且，更嚴酷的挑戰將來自於產業部門與政治部門的壓力。展望二十一世紀，所謂「知識經濟」將成為全球產業活動的主流。在資本主義生產與再生產的過程中，不論是「垂直分工」或「水平分工」，產業部門都會進一步要求高等教育部門提供更能為產業分工體系所使用的人力資源。這種來自產業界的需求與壓力，將使大學更快速淪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知識生產工廠。另一方面，台灣政治的快速民主化，使權力的掌握者從選票的數量而不是從教育的邏輯，思考教育資源的分配問題。最近十餘年來，台灣的高等教育資源逐漸轉移到中等及初等教育部門，就是一個例證。憲法中教科文預算不得低於總預算 15% 規定的取消，更是另一個明顯的例證。此外，政治人物在選舉拉票演講會場中逕自宣佈將專科學校「升格」為學院，或將學院「改制」為大學，更可見政治力在教育部門所劃下的傷痕。政治力與經濟力對大學的宰制，由於大學研究與教學的日趨專業，以及各學門間的疏離，而更具殺傷力。²²

這以上這個角度來看，二十一世紀台灣的大學院校將面臨的重大問題之一是：如何正確而有效地因應並與經濟力（及政

²² 參看：Bruce Wilshire, *The Moral Collapse of the University: Professionalism, Purity, and Alienati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0), esp. pp. 35-98.

治力) 互動?我過去分析這個問題時曾指出:大學與台灣產業界的互動將日益頻繁,在這樣的特殊脈絡中,大學的師生應該避免過度膨脹主體性的謬誤。大學不是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的象牙之塔,大學是與社會攜手連心,共存共榮的知識部門。因此,大學不應過度膨脹主體性,而斬斷與大學以外的經濟、社會等部門之有機聯繫關係。但是,大學也應避免喪失主體性的謬誤。大學與產業界關係緊密,不應該使大學喪失其主體性。相反地,大學應該深切認知大學與經濟領域之間,存有既合作又緊張之複雜關係。只有正面而深刻的體認這種複雜的互動關係,大學與產業界才能夠各自邁向健康的發展。而就大學來講,大學是學術的社群,不是一個營利事業,這項認知是使大學主體性適度發展的重要前提。²³同樣道理,在大學院校與政治力互動之時,既要避免過度膨脹大學主體性,又要避免淪喪大學的主體性。

本章扣緊大學主體性的建構這個中心課題進行分析,我們首先指出當前大學院校在政治力與經濟力的衝擊之下自我異化的幾種類型——大學常淪為知識的百貨公司、意識形態生產工廠、或職業訓練中心。我們回顧傳統中國的大學與現代大學的不同在於:前者以道德關懷創造知識的基礎,而後者則以功利主義為其動力。在分析這兩種型態的大學之後,我們直指大學

²³ 黃俊傑:〈從當前台灣高等教育脈絡論大學與產業界之關係〉,收入:本書,第七章。

的根本性質在於它是一個知識社群——大學屬於知識份子，由知識份子統領、並為知識的創造而存在。從大學的知識社群特質來看，當傳統社會的大學之作爲道德社區的特質被解構之後，現代大學的師生關係就不免走上契約關係，而使大學的知識社群之特質，受到一定程度的傷害。

從本章的分析，我們發現：大學理念的重建與復興，正是建立大學的自主性與主體性，使大學與產業部門及政治部門在互動中不喪失其「自我」的根本方法。讓我們以信心和愛心，期待二十一世紀台灣的大學作爲知識社群之特質日益彰顯，從而使大學作爲社會「清流」的角色日益明確，而爲二十一世紀海峽兩岸注入新的生命力！（2000年11月4日初稿，11月26日二稿。）